

蘇聯經濟改革政策之研析

王承宗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言

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改革浪潮不僅吸引了全世界的矚目，而其內部劇變是否「質變」或「蛻變」，是否脫離和揚棄社會主義道路，更引起外界的興趣。追溯這股「蘇東波」浪潮，與其經濟改革有密切關連，亦與戈巴契夫的新思維政策相關。經濟改革是共黨國家數十年來多次出現的重大政策與措施，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蘇聯開始的柯錫金改革和接續的一九六〇~七〇年代東歐各國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修改經濟管理體制及放寬原為嚴苛的經濟生產所有制。中共則在文革結束後，特別在一九七九年後開始也大幅度實施經改和開放政策。

無論是重大經改或隨時的、小幅度的修正，經濟政策變化直接反應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發展過程出現的弊病與困難。更反應了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缺陷，前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 (Yu. V. Andropov) 坦認蘇聯「至目前仍未研究社會生活與勞動應有的規範，未完全揭開其規律的本質，特別是經濟方面。因此，不得不採用經驗法則，亦即全然不合道理的試誤方法 (methods of try and error)」。^①亦即經濟政策是在小規模實驗之後擬定的，正如中共的桃園經驗、大慶和大寨經驗，是人為、局部的模擬經驗。其所以如此，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留給我們的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特徵、本質特徵的判定。他們並沒有陷入瑣碎的描述，並沒有想去描繪社會主義的細枝末節。他們談的是理論上可以預見的階段」。^②顯然地，十九世紀的馬克思及其他社會主義創作者祇是理論地設想社會主義面貌和特點，而且是以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為背景，試圖尋找一個適合勞動階級生存的社會環境。此外，這些社會主義運動先鋒和理論大師對舊社會批判的多，對新社會構想的少。甚至是俄共革命領導人列寧，亦是「對社會主義的解說過於簡化，往往失去其理論深度和意義。這些包括像社會所

註① Yu. V. Andropov, *Izbranyye rechi i stat'ii*.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y literatury 1983), p. 294.

註② 戈巴契夫，改革與新思維（中譯本），（北平，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頁三三三。

有制、階級與民族關係、勞動程度與消費尺度、合作化、經營方法、政權與自主管理……等關鍵性問題。」^③簡言之，包括列寧在內的社會主義經典作家祇具有一模糊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和草圖，如何去實踐和建設新社會，祇有「摸石頭過河」了。而且蘇聯的社會主義理論觀念迄今仍停留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的水平，亦即停留在史達林初期的工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階段，當然無法解決日益複雜的社會主義社會問題和其他重大困難。何況史達林時代的理論不但僵化了，而且亦歪曲了社會主義的本質。^④

儘管史達林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具體化的政策對當時的蘇聯有作用，但是教條化的理論延續至今就成為大害了。因此，重新界定社會主義理論，包括經濟理論和政策，乃成為現今蘇聯及東歐共黨與學界的要務。本文主要在探討蘇聯經改政策，及溯源探討社會主義理論的空洞化。因其空洞無物，導致經濟政策和實際需要時時修正改革，否則整個經濟機制便要窒礙難行，甚至停擺。

貳、經改的背景

一九八五年三月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臨時中央全會的就職講話中指出「在廿六大及其後的中央全會擬定的戰略路線，將不改變。此即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路線，完善全面社會生活的路線。……為順利及快速解決此任務，必須及更堅定完善經營機制及所有的管理制度。」^⑤意即蘇共經濟、社會政策延續不變，並且繼續進行前任者留下的改革政策。到四月中央全會，戈巴契夫更明確指出「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的成功，出現不利的傾向和不少的困難。……現在有了更清楚的經營機制改造 (perestrojka) 的觀念。……」^⑥亦即在此次全會 (係為籌備廿七大召開之會議)，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和意願更為明顯。

在同年六月蘇共中央召開的「加速科技進步問題」會議上，戈巴契夫說，不能不看見，自一九七〇年代初，經濟發展開始感覺有些困難；四月全會對此的結論是因為過去不曾考慮根本的改變經濟情勢及在改造結構政策、管理方式與形式、經營活動心理方面表現必要的堅定。關於將經濟成長重心轉移至集約因素已說了許多年，但所採取的措施，都是猶疑不定的、不

註③ M. S. Gorbachev, O perestrojke i kadrovoy politike partii, *Kommunist*, No. 3, 1987, pp. 7-8.

註④ 參見註③，頁三三—三四，和註⑤。

註⑤ M. S. Gorbachev, *Izbranyye rechi i statii*, vol. II (Moscow, Izdatel'stvo politicheskoy literatury, 1987) pp. 129, 130.

註⑥ 同註⑤，頁一五四、一五八。

連貫的，最終沒有實施。他說，結果經濟繼續慣性地在粗放基礎上發展。他指出，改造經營管理的主要方向是明確的，就是更深入和全面利用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沿著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民主集中制的路線前進。在管理與計畫提高集中化的效率，顯著擴大企業與聯合的經營自主性和責任，積極使用更深入的領導方法與形式，經濟核算與商品貨幣關係，一切經濟槓桿與刺激——這是改造的原則性核心。^⑥同年七月中旬，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根據此次會議結果，頒佈「關於擴展經營新方法及加強其對加速科技進步的影響」決議案，決定一些新措施，包括新式產品售價提高、出口外匯留成等。^⑦

一九八六年二月蘇共召開廿七大，祇略略提及完善管理制度問題。到六月中央全會，戈巴契夫批評說，黨大會以後的時日顯示，新經營方法的啓用和進展在不小的程度上受阻於管理機關繁重和無效率的工作。中央經濟部門、部會與企業、生產聯合、勞動集體之間權利、義務再分配過程十分不健全。甚至在改變管理機關的功能時，一些領導人企圖以其他方式保持自己的命令權力。^⑧簡言之，在戈巴契夫上臺將近一年半之後，發現經濟改革並不順遂，雖然經改祇是前任政策的延續。而且阻礙出現在上層管理機關和領導人身上。亦即經改受制於官僚體系難以前進，因此政治改革顯然就有必要了。

到一九八七年六月蘇共中央全會批准戈巴契夫「經濟管理根本改造」報告和方案，以及決定在一九八八年六月召開蘇共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討論政治改革問題。至此經改進入新里程，突破舊框框限制；政改亦提上了日程，蘇聯黨政體系開始新的變革。換言之，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之前的經改是舊任的、不完整的改革；其後才是戈巴契夫的大改革。

自一九六五年柯錫金提出的「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畫工作、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改革方案後，改革面向十分廣泛，而其基本是以獎金制鼓勵生產和改善勞工的社會文化生活條件為主，而利潤掛帥的結果並未完全解決經濟生產問題，亦即經濟仍以粗放生產為主，未能走上集約發展道路。產量雖多未能符合市場需求，未能節約原材料成本，未能提升科技生產水準。到一九七九年七月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頒佈「改善計畫與加強經營機制對提高生產效率及工作品質的作用」決議，此項議案成爲一九八〇年代經改的總指標。^⑨一九八三年六月的「勞動集體法」和七月的「企業實驗法」，其內容多源自該決議。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的「個體勞動法」及其後的經濟法規逐漸脫離決議案精神，賦予更大彈性和自由。

決議案主要包括——(一)提高計畫工作水平；擬定二十年期科技進步綜合綱領和十年期社會經濟發展計畫。改變計畫方式，

註⑦ 同註⑥，頁二五三、二六九。

註⑧ KPSS, v rezolyutsiyakh i resheniyakh s'ezdov, kontentstii i plenimov tsrk. Vol. 15, pp. 29-35.

註⑨ M. S. Gorbachev, O pyatiltinem plane ekonomicheskogo i sotsialnogo razvitiya SSSR na 1986-1990 gody i zadachakh partiinykh organizatsii po ego realizatsii. Kommunist, 1986, No. 10, pp. 5-36.

註⑩ KPSS v rezolyutsiyakh i resheniyakh s'ezdov, kontentstii i plenimov tsrk. Vol. 13, pp. 408-451.

企業根據訂貨契約擬定生產計畫，職工會參與計畫擬定。改變經濟指標，以淨產值代替總產值，規定降低成本任務。規定科技運用與新產品任務。(二)加速啓用生產力與提高基建投資效率。(三)發展經濟核算與加強經濟槓桿和刺激的作用；以生產聯合爲核算基本單位。發展勞動集體的建議權與擴大生產聯合(企業)權力，建立物質鼓勵、社會文化措施、住宅建設與生產發展基金。企業可保留部份超額利潤。規定信貸授與原則。新式產品准予提高售價和補貼。修定工資標準和裁員增產給予加給辦法。但是伴隨決議案之後陸續推出的改革法令顯然缺乏連貫性與完整性，而且仍屬於片面的改革。

另一方面，蘇聯經濟表現顯然每況愈下，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平均每年生產的國民收入成長率爲七·八%，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降爲五·七%，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再減爲四·三%，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祇有三·六%。^⑭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亦是三·六%。^⑮這種逐步下跌的經濟情勢正如戈巴契夫所言「國內形勢已經潛伏著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⑯從實際狀況而言，低度成長率證明蘇聯開始失去前進的速度，經濟工作中不斷出毛病，困難一個接著一個，開始成堆而且日益嚴重，未能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⑰

這些毛病、問題自然涉及經濟制度和人事問題，而其實際困難表現在：(一)例如農業的低度成長，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平均年成長率祇有一%，一九八二年五月「糧食綱領」揭示的自給自足目標完全落空，^⑱每年仍需消耗大量外匯進口糧食。(二)工業生產落後與產品品質低落，不足以滿足人民需求，儘管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年平均每年消費性工業生產成長率爲三·九%，同期國營與合作社商店零售額成長率爲四%(不含酒精飲料)；而且蘇聯人民的儲蓄額從一九八〇年的一、五六五億盧布增至一九八五年的二二〇八億盧布，增幅六四三億盧布。^⑲另外，物資囤積量從一九八〇年三九二億盧布增至一九八五年的七〇一億盧布，增加三〇九億盧布。^⑳三項指標顯示儲蓄過多與貨物積壓過重，亦即消費需求大於供應，以及廠商囤積過多和低劣商品賣不出去。(三)科技發展與生產企業引用程度不足，亦即生產技術落後；外貿成長低落，出口貿易偏重於原材料、燃料輸出、出口附加值低；基建投資增大而基建期限延長；勞動生產力低落等。

註⑭ *Narodnoe Khozjstvo SSSR za 70 let*, p. 51.

註⑮ *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89, No. 5, p. 2.

註⑯ 同註②，頁七。

註⑰ 同註②，頁九。

註⑱ 眞理報，一九八二年五月廿七日，頁一—三。

註⑲ 同註①，頁五一、四四八。

註⑳ *Vestnik Statistiki*, 1988, No. 1, p. 80.

叁、經改的範疇

蘇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斯留尼科夫(N. N. Slyun'kov)和主管經改任務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阿巴金(L. I. Abalkin)院士表示，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央全會擬定了經濟改革的觀念。^⑧戈巴契夫在該次中央全會的報告首先指出，可以確信的說，過去兩年國內政治情勢本質的變化，必須改造社會發展日益增加的矛盾，這種矛盾在逐漸累積中，若不及時解決，其實質將成爲瀕臨危機的形式。戈氏進而說明將蘇聯經濟從瀕臨危機景況挽回的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深入、真正的革命性改組。首先就是建立完整、有效率的經濟管理制度。^⑨而實現從行政管理過渡到以經濟方式的領導管理，更廣泛的管理民主化，全面調動人的因素，這些過渡原則包括：(一)急劇擴大企業與聯合的自主權限，變成爲完全的經濟核算、財政獨立，提高其對最後生產結果的責任，建立勞動者收入與其工作成果的直接聯結，廣泛發展集體承包。(二)根本改造中央經濟領導，提高其品質水準，集中在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品質、速度和比例，解除中央對下級經營單位作業活動的干預。(三)根本改革計畫、價格、財政信貸機制，過渡到生產資料的批發貿易及改造對科技部門、對外經濟聯繫、勞動與社會關係的管理。(四)建立新的組織結構，以保障加深專業化及提高合作聯繫，將科技直接納入生產，以此突破世界品質水準。(五)從直接的中央命令管理制度過渡到民主的、自主管理制度，建立發揮個人潛力的機制，明確規範黨、蘇維埃與經營機關的功能及根本改變其作風和活動方式。這五項原則和其解釋成爲經改的基本範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的全蘇經濟改革基本問題會議上，阿巴金強調：(一)經改具根本性質，這不是更新行政命令制度，而是以新的社會主義經營模式取代之。(二)經改不是單獨、孤立的事件。它是改造的組成部份。經改是國家政治更新、社會不斷民主化的前提，是改造的經濟基磐。(三)改革的深入和本性意味著它不僅涉及經濟的外在形式和結構，中央管理機關、財政信貸制度、槓桿與刺激的功能和組成；它亦貫穿經濟制度的基礎，涉及所有制的更新。(四)改革不是以其他制度取代社會主義，它是更新社會主義，給予第二次的生息。^⑩

經改的過渡期約五、六年。第一階段正進行中，並擬在一九九〇年結束。此階段需解決(一)財政危機和穩定消費市場，(二)立法處理銀行制度、反通貨膨脹和反壟斷及其他法規。(三)改變社會心理狀況，爭取人民支持，遏阻社會不良風氣發展。簡言

註⑧ *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89, No. 47, pp. 1-3.

註⑨ M. S. Gorbachev, *O zadachakh partii po korennoy perestrojke upravleniya ekonomikoy, Kommunist*, 1987, No. 10, pp. 5-72.

註⑩ 同註⑨，頁11-14。

之，這是立法階段。第二階段自一九九一年初開始，為期二年，這是新舊經濟機制混合期。繼續解決財政與消費市場問題，實施新法規（所有制法與統一徵稅法），全蘇實行自主管理與財政獨立原則（各加盟共和國與地方自治與財政獨立）。完成銀行制度改革，包括利率政策；發展生產資料批發貿易；同時擴大市場關係中契約、限制、自由三種價格的範疇，向社會主義市場發展，削減中央行政管理與監督範疇。建立經濟調節機關：金融檢查、價格與稅務檢查、反壟斷委員會及其他機關。第三階段自一九九三年或五年計畫中期（一九九三年中）開始。此一階段內，國家採購從絕對採購過渡到自願和競爭性採購（亦即從指定採購變為競標採購）。批發與金融市場開始發揮作用。

從經改的問題或對象言，大致可分作下述數項：

一、所有制問題——立法規範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是多種形式的。此種社會所有制包括國家（全民）所有，合作社所有，社會組織、股份公司、其他經營同志會和私人所有。國家所有制可分為全聯邦所有（蘇聯）、聯邦和共和國共同所有（蘇聯與加盟共和國共同持有）、共和國所有（加盟共和國與自治共和國）、民族區域與行政區域組成的所有（公共所有，即地方所有）。這是對過去單純的國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合作化所有制的大改革。一九七〇年蘇聯固定資產由國家所有的比例為八三%，一九八八年增為八八%；而私人所有的比例相對由八·六%減為三·四%（其餘比例為集體農莊所有）。^②私人所有主要是住宅和牲畜。

將國家所有細分的目的在達成共和國與地方經濟自主與財政獨立；擴大集體所有的目的在加強這些集體企業的活動能力，作為對國營企業體系的補充。同時在禁止人剝削人的原則下，准許私人經營企業（以服務性行業為主）。擬定中的股份公司法將其確認為集體性質的企業，可能准許私人持有股份。

土地所有問題在土地法規定所有權仍為國家所有，但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使用者可以長期承租方式享有使用權。使用權可以轉移和繼承。

二、中央經濟機關改革——逐步改組和裁併中央經濟管理機關（部會、部門），修改其職權、功能；主要在終止中央部會對下屬企業、聯合的行政管理權力。中央部會成為監督、政策擬議單位，同時裁減機關行政員額和機構，以及職權相疊機關。蘇聯外貿部和對外經濟聯繫委員會於一九八八年元月合併為「蘇聯對外經濟聯繫部」即其例。

三、經濟管理制度——一九八七年六月頒佈的「國家企業法」（已部分修改，且準備再修改）是管理制度改革範本。聯合、企業、公司的經營採自主管理、財政獨立、自負盈虧原則，職工大會或代表會議有權選舉領導幹部（聯合、企業、公司、

其所屬機構、車間、部門、生產隊等主管、領導人）。三萬七千個工業企業、數千個部門和地域部門聯合根據「科學研究——投資——生產——銷售——服務」的環節發展業務。對於一千七百個農業單位、七千五百個工業企業和其他企業，這些虧損合計超過五十億盧布，將立法清算之，預定自一九九一年施行。^②

所有國家企業在一九八九年完全按企業法實施新制。

四、金融改革——包括設立專業和商業銀行；國家改變投資政策，對舊有企業不再撥款作基建投資，企業資金需由信貸管道取得（相對由金融業監督企業財政）；為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發行新公債和拍賣部份國有住宅，以及鼓勵合作社和私人興建住宅，同時藉以消耗私人龐大的儲蓄。建立統一的所得稅法，以徵收企業所得稅代替原有利潤上繳制，並擴大稅基，增加對合作社徵稅幅度及開徵私營企業所得稅。

五、承包制度——生產和建築企業由勞動集體按契約承包，農業生產則由農民按集體、個體和家庭方式承包。承包制可減少勞工員額和刺激生產。租賃法甚至規定企業、農地租賃予承包經營者。

六、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從往昔的計畫經濟制度轉變為中央有限度的、戰略性經濟計畫（取消從上至下的計畫制度），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就市場範疇而言，包括生產資料批發市場、金融信貸市場、勞務市場以及自由的消費市場。在價格改革下，根據供需原則形成市場機能；同時又需防止人為操縱供需和壟斷。

肆、困難與阻力

經濟改革不僅要改變經濟管理制度，而且要建立市場機制，涉及範疇上至中央機關，下至企業、公司。涉及內容包括計畫體制（含管理指標）、物資技術供應方式（國家採購與分配）、金融信貸制度（含國家投資政策、稅收制度、銀行監督企業使用貸款、金融機構商業化）、勞動與工資關係（修訂工資等級和計算生產成果、放寬承包方式）。涉及人事問題包括各級領導人員去留，任職幹部升黜績效與外流、人才培訓問題等。這些衆多問題需要以新法令或修法充實之，更需要在執行上破除舊習和阻力。

隨著經改進行，可見及的阻礙包括：

一、官僚體系障礙——正如戈巴契夫所言，人們表示，他們支持改造，但並未見及周遭有改變。改造未觸及勞動集體、城

註② 同註①，頁六。

市與鄉村。許多人指證這個事實。意即，儘管作了重大努力，改造在許多地方仍未進行。問題就在於黨、蘇維埃的領導人和經濟幹部時常說：「我們知道新任務，但給我們時間評估情況，掌握新的活動方法和形式，實際運用它們。」因此戈巴契夫明言，這些領導人員和幹部需負更大的責任；而且他承認，改造在地方祇是開頭，並未處處同時進行，在某些地方仍保持惰性、無創意的「禁區」。^{②④}

蘇共的自上而下的經改雖然得到上層多數的支持，但愈往下推進，阻力亦愈大。蘇聯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阿巴金本身即遭到攻擊，被稱作「經濟阿巴金化」、「阿巴金種族危害者」。例如：反對改革的保守派系之一，「勞動者聯合陣線」（Ob'edinenyi Front Trudyashchiksva）是由兩種人組成，一是經濟領導人，另一是從事半技術性、半專業性（亦即無專精職技人士）的人員。前者擔心經改使他們喪失現有權力地位；後者擔心他們不能在生產勞動中再濫竽充數，會被淘汰失業。^{②⑤}這些保守勢力（還包括一些學者）的阻礙，必然影響經改的進程和實效。

二、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根據蘇聯政府報告，一九八九年初國債達三、一二〇億盧布，預算赤字一、二〇〇億盧布，對外經濟債務三四〇億盧布。^{②⑥}國債包括政府債券（由居民持有者）、國家保險局保險單（居民付出保險金）和政府向全國貸款基金的借款。蘇聯預算帳面收入包括前述三項，扣除部份保險支出和債券償還，主要以借款形式處理預算赤字。一九八五—一九八八年每年借款數額分別是一八〇億、四七九億、五七一億和九〇一億盧布。實際預算赤字四年間分別是一三九億、四五五億、五二五億和八〇六億盧布。^{②⑦}一九八九年預算赤字估計為九二〇億，一九九〇年六〇〇億盧布。^{②⑧}在公債持續發行與赤字劇增下，蘇聯國債將年年遞增。

一九八五年蘇聯居民儲蓄額二、二〇八億盧布，到一九八八年增至二、九六七億盧布，平均每位蘇聯居民（無論老幼）擁有一、〇三五盧布存款。蘇聯職工平均每月薪資從一九八五年一九五·六盧布增至一九八八年二一九·八盧布；一九八六年增加二·九%，一九八七年三·七%，一九八八年八·三%。^{②⑨}一九八九年前半年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一〇%。薪資增長高於國民收入增幅（用於消費與積累的國民收入成長率一九八六年一·二%，一九八七年一·七%，一九八八年五·七%）。

註②④ 同註②。

註②⑤ *Nedel'ya*, 1990, No. 14, pp. 2-3.

註②⑥ *Izvestiya*, August 5, 1989, p. 3.

註②⑦ *Narodnoe Khozaystvo SSSR, v1988g.*, pp. 624-625.

註②⑧ L. A. Voronin 和 V. S. Pavolov 編輯，*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89, No. 40, pp. 5-13.

註②⑨ 同註②，頁七七、九六。

一九八九年上半年國民總生產毛額(GNP)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三·五%。^②

居民儲蓄與工資持續增加，但消費品供應(銷售總額)在一九八六年祇增加二·五%，一九八七年增二·八%，一九八八年增七·一%。這種情形無疑形成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和通貨膨脹的壓力，而盧布幣值亦相對低落。若無法控制物價增漲和工資增幅，經改的努力勢必半途而廢。

三、社會秩序失調——隨著改革與公開，社會羣衆的需求日益高漲，不僅是政治方面的，而且多屬於經濟層面。例如亞美尼亞人與阿塞拜疆人之間的種族衝突與暴動，煤礦工人的罷工，各種的示威運動，以及最近對立陶宛的經濟制裁。這些有形、無形的社會秩序失調和風氣敗壞，對改革不無影響。

伍、經改的前途

一九八三年蘇聯經濟學界提出一份「新西伯利亞報告」(the Novosibirsk Report)，該報告據傳是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經濟部門、蘇聯科學院和蘇聯國家計畫委員會的聯合討論會提出的。報告建議採取非集中化的經濟制度，解除企業生產限制並准許自行尋找買主和賣主。因為史達林經濟體制在當時是有用的，但現今已再三調整和修正。^③該報告所作多項建議和後來的安德洛波夫改革(勞動集體法和企業實驗法)有關。經濟學界的建議或意見亦經常成爲蘇共經改的起源，在戈巴契夫現階段，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長阿巴金即受重用，被任命爲部長會議副主席(副總理)並兼任一九八九年七月成立的「蘇聯部長會議直屬國家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負責推動經改。

但是蘇聯經改顯然同時參酌本身和外國的經驗，斯留尼科夫即強調「現今極重要地集中努力於改造的形式、方法，利用本身和世界的經驗於此」。^④一九八七年元月的合資企業法准許外資在蘇聯共同投資，以及設立出口特區構想的構想均借鑒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措施。建立社會主義市場機制更雷同於東歐國家的改革。

問題在於經過數十年不斷的調整改革，發展至今的經改是否是最終的改革，是否能順利建立市場機制。經營管理制度改革使企業自主管理和自負盈虧，但企業爲追求產品最大利潤自行改變產品內容，反而造成市場供需失調。例如肥皂工廠集中

註② 同註①，頁17。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89, No. 32, pp. 13-16.

註③ Survey, 1984, Vol. 28, No. 1, pp. 83-108.

註④ 同註①，頁六。

生產高值香皂，而不生產洗濯用肥皂。民生消費品的高值生產取向形成普通、低值消費品極端缺乏。同時企業假借產品新包裝、新式樣和新產品而提高銷售價格。形成銷售額增加、量却減少的現象。此與蘇聯生產企業的壟斷本質有關。物價上揚與供需失調源於企業無競爭性，即因企業結構為大而全的國營單位，早已壟斷市場供應。因此企業管理不改革，企業無利潤無效率，一改革利潤增、工資獎金分配多，但量反而減少了。

由於經改規模既深且巨，法令的製定、幹部的適應能力和再訓練、勞工技術水準提升與新勞動條件的適應、領導官僚權責變化，這些涉及法與人的問題，本身極為複雜，而且成爲經改成效的考驗。

經改的結果是否使蘇聯社會主義變質，使資本主義復辟。儘管戈巴契夫和其他領導人再三申明，這是社會主義改革，更新社會主義。但在保守派看來，外資的湧入、個體企業興起、貧富差距的擴大、所有制的變革和土地租賃與承包、生產企業的租賃和勞工失業等問題和現象，是社會主義的退却。

因此，經改的前途在這段過渡期間尙難定論，在新舊交替、舊廢新未舉的階段，混亂和失調似乎是難免的。不過一個龐大的計畫經濟體系改變爲市場經濟體系，又要維持所有權的國家所有；這種改革本身就是一種革命。

*

*

*